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学而思

要精要管用要讲新话

——侯少文教授谈邓小平关于学经典的思想点

编者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党员干部修身、为政的必修课。邓小平关于这一问题有哪些基本观点？领导干部该怎样学和用？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

□ 本报记者 李少军

老祖宗不能丢

记者：“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的著名警句。刘云山在2014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也强调了邓小平的这一名言。请问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深层含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侯少文：1991年8月，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既是对那种我们可以完全抛弃老祖宗而改换门庭、另起炉灶的主张的严肃批评，也是对那种讹误我们的理论和路线已经背叛了老祖宗之论的有力辩驳。

1986年9月，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象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我们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思想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老祖宗不能丢”其实质，就是希望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

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记者：邓小平怎样看待领导干部学马列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侯少文：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了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有的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记者：邓小平曾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在他看来，什么是“精”？“管用”的关键是什么？

侯少文：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非常鲜明地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学马列所要的“精”，可以理解为这样三层含义：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个观点和方法，能够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确非易事。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清楚经典作家是怎样提出这些原理，这些原理的实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成教条，就一定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知原理为何物，就只能记诵老祖宗的个别词句。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就是实事求是。不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这三层含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贯通和依存，不能割裂，不能偏废。

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应用”也好，“管用”也好，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既要学经典又要讲新话

记者：老祖宗不能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既是高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手，同时又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善于讲新话的光辉典范。他的哪些论述能体现这一特点？

侯少文：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不丢老祖宗与讲新话，是辩证的统一。学经典，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讲新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讲新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用典释义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

■讲话原文

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出处解说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惟尽知己之所短而后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不然，但取己所明而已，但取己所近而已。

——清·魏源《默觚下·治篇七》

意思是不了解一个人的短处，也不了解一个人的长处；不能发现一个人长处中的缺陷，也不能发现一个人短处中的闪光点，便不能正确地用人、教人。用人之道在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教人之道在于让人发扬长处，克服短处。

《默觚》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哲学著作，撰于清道光十五至十九年（1835—1839年）。“默”取自魏源的字“默深”，“觚”为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本书分《学篇》《治篇》两大部分。此段话是魏源在评价历代用人制度的得失和揭露清政府用人制度的弊端时提出的人才思想。

（刘建斌）

以阅读滋养人生 结合人生来阅读

□ 周云波

全民阅读已成社会共识，但一些人还没来得及深思熟虑读什么，就开始了从众式、跟风式、一窝蜂式的阅读。有的看畅销书，也有的看别人在读的，还有的看名人推荐的，尤其是对一些经典趋之若鹜，甚至不分年龄大小都拿着同样的书在“啃”。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阅读对于人的精神提升不可或缺，以阅读滋养人生，结合人生来阅读，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无疑，勤学要趁早，因为早有早的优势和好处。《字字锦》的作者陆春祥写道，自己七岁的时候背诵过《鲁灵光殿赋》，后来，每隔十年温习一次，一直不曾遗忘。二十岁以后背诵的经书，如果一个月不去温习，就很容易荒废。再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生命是有限的，若能尽早地熟读有关书籍尤其是一些经典可直探人性本源，汲取人生智慧，从而把准人生方向。如国学所蕴涵的“仁、义、礼、智、信”，能让人以健康的心态来适应社会变迁中的不确定因素；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气与豪迈有益于青年立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更是不可多得的激励警句。

古语讲，开卷有益。但凡用点心读了的，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收获。有的可能了解了字面意思，有的可能学到了一点皮毛，还有的可能摸到了“大象的一只腿”。但也不排除一点也没搞懂，甚至产生了误解的。那些涉世不深如一张白纸的年轻读者更是如此。如小时的傅斯年，把《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对先生教的“正心”“诚意”“不欺暗室”毫无知觉。就像孔夫子说的五十岁才开始学《易经》的道理一样，傅斯年有一次听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匿名揭帖批评别人的同学：“在墙壁上攻击同学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这样使受之者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为必是品性沉沦之端。”这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

有许多书籍特别是作为民族文化和知识结晶的经典艰深难懂，不是什么人都能读得了的，完全理解它们还要一定的人生积累。而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工作经验、人生阅历等各有高低，尤其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如果当下的小青年去读知青作品，就可能与亲历者或距离不远的人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出入。所以，对于同一本书而言，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去读。而要真正理解一本书，需要的不仅是读者的语言文字水平，更要对人生有一定的理解和感悟。

在《幽梦影》中，清朝的张潮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书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少年时读书，是从字面上理解；中年时读书，是用人生的历练去理解；老年时读书，是用全部人生去理解。这也是曾参七十岁才开始学习，终于名闻天下的原因之一。换言之，读懂作者的思想需要读者走过了一定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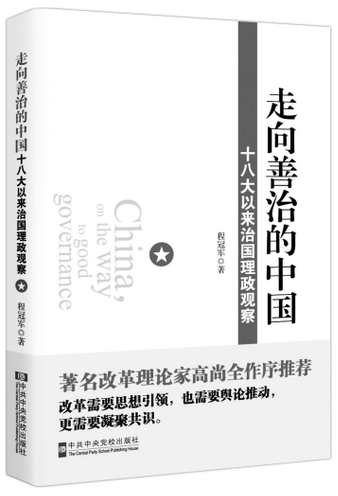
从字面到历练到全部人生，每次阅读应该都会读出新的感悟。作家孙犁年轻时，倾注了大量的思考去读《聊斋志异》《红楼梦》《庄子》《太平广记》《史记》《二十四史》等古籍。尽管读过多次，但到晚年再次阅读时，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文人笔记、故事传奇都读得津津有味。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他认为首推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虽然其中的神鬼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每个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内涵，却都触及生活现实，是作者借狐仙之口讲述现实社会中的苦难。有一定阅读经历的读者，都有同样的体会。

客观上讲，读书的境界与年龄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并非一一对应。事实上，由于各自的文化层次、思维水平等存在差别，一些年长的人理解不一定就深刻，而年轻的不一定就肤浅。如能读懂当然更好，即便不懂也可以为日后埋下种子。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所以，年轻人也可以多读一些人文社科经典。一些人能够成名成家，就是从小熟读苦读诗书古籍，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思考的关键，是要结合人生感悟去读书，感同身受、融会贯通，细细品味书中的喜怒哀乐，深深体会蕴藏在文字后面的历史真实、科学道理、人心善良和审美情韵。1935年红军长征后，因病被国民党抓住的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多余的话》中，最后有一句特别精彩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这么多年来，各界人士、党史研究者、历史学家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有人从佛教的观点解读，都不得其解。而《中国担当》的作者辛子在农村生活时做过豆腐，结合人生经历及所受教育，作出了合理如下的解读：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五千年历史进程这个“大磨”当中，就是这么被碎、磨、碾、压、蒸、点化、刀切出来的，是文化最精华的部分。千辛万苦，制作出来的很白很纯；但是极软，最容易被破坏，被“吃豆腐”。所以，自视为中国传统“士人”的瞿秋白讲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说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话，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一本辅导我们读懂文学书籍的没有整理成文的工具书。在阅读人文社科书籍中遇到问题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或他人的人生，用发散思维将其中蕴含的哲理、逻辑、经验和方法等与所读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可能会豁然开朗，一些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重点推荐



书名：《走向善治的中国——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观察》
作者：程冠军
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年5月

编者按：《走向善治的中国》一书日前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6月28日在广东举行了“善治文化理论研讨会暨《走向善治的中国》首发式”。该书由著名经济学家、改革理论家高尚全作序，主要内容为作者撰写的“评论员”和“观察员”文章，以及其他理论文章；另外，还有作者与理论界知名学者的对话访谈。全书25万字，较为全面地解读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在研讨会上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一致好评。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走向善治的中国》这个书名立意很好。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方略的引领下，中国正走向善治。

《走向善治的中国》全书共有七个章节，分别是“改革进行时”“解读中国梦”“学而时习之”“问政互联网”“反腐无穷期”“善治中国”“资政对话”。前六个章节是作者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共57篇；最后一个章节是作者与理论界学者的对话，共9篇。全书内容涉及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国道路、中国梦，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本书的评论文章文风新锐，敢于直面问题；理论文章也勇于探索，见解独到；对话访谈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多个侧面。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观察，这个副标题很贴切，也很有深意。观察是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观察不是简单的看，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问题意识。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既要当好宣传员，也要当好观察员和评论员。只有当好观察员和评论员，才能以问题意识和建设性意见推进改革。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改革无穷期，改革无坦途。改革需要思想引领，也需要舆论推动，更需要凝聚共识。

韩庆祥（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

本书有很多好的观点，其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作者把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联系又区别开来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7个地方谈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从表述上看二者是有区别的，两者之间要么有顿号，要么有逗号，要么有“和”，顿号、逗号、“和”的前后的意思绝对是相对独立的，它不仅是表述，而且内涵也有本质区别。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所以叫伟大复兴、伟大梦想，这个伟大复兴、伟大梦想绝不只仅仅停留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它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是要跻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世界强国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程冠军同志把它区分开来这是一个深化。我认为，如果再把它深化一下，这实际上可概括为“新三步走”：第一步，建党100周年的时候，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国梦，而且对我们科学地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是一个参照。

师曾志（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概念的合法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升级。善治概念的提出以及观念的传播，依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简言之是在新媒介赋权背景下在传播中解构与重构着社会关系所引发的。

新媒介在原有国家—社会关系中建构起了不断变动的新的权力场域，我们称之为新媒介赋权。新媒介赋权中的“权”，指的是权力而非权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介赋权渗透到国家权力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之中，由此也重塑着政府、企业、社会、媒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社会多元主体“善治”与“共治”的基石。新媒介赋权，官员首当其冲，因此政党和政府官员拥抱互联网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本书作者在《走向善治的中国》“问政互联网”一章中把不懂网络的官员划分为四种类型，即鸵鸟型、放羊型、叶公好龙型、滥竽充数型。可谓一针见血，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反思并积极改变。

我认为，程冠军完成《走向善治的中国》一书，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作者的媒体人身份。作者敏锐地洞察着新媒介赋权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的解构与重构，并提出了许多引人思考的前沿问题和建议。这些问题和建议有助于我们在国家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博弈中实现多元共治，共筑美好的善治社会。